

# “雨果奖”获得者郝景芳和她的“童行星球”

■ 本报记者 王会贤

位于南五环边上的蒲公英中学,是北京市第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中学。7月17日,“雨果奖”获得者郝景芳和她朋友们举办的“童行星球”夏令营正在这里进行。郝景芳在给孩子们上“奇幻影视故事创作”课程,她的最终目标,是将孩子们的创意,制作成电影。

因为雨果奖的明星效应,郝景芳的公益项目“童行书院”得以更快落地,“童行星球”作为其中一部分,进行了一系列创意课程研发,这些课程已经开始在这次的夏令营中给孩子们带来知识和乐趣。

## 一节“魔法课”

夏令营第一天的奇幻之旅,从构思一个魔法或神兽创意开始。在观察了各种电影中的创意之后,同学们开始分组设计拥有各种魔法的小怪兽。

一位颇有责任心的男同学

设想他的神兽可以掌控冰雪,在火灾发生时,用冰变成滑梯放在窗口,人们就可以逃出来。另一位调皮的同學希望自己的神兽可以隐身,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小偷身边,吓走他们。还有一位设想自己家开了餐馆,如果有客人挑事儿,小神兽会帮他打架……

有了最开始的创意,接下来,郝景芳和更多专家老师将带他们尝试情景设计、故事设计、舞台呈现、剧本创作等。她希望能帮助孩子们编织出一些故事、设计剧本原型,然后再找专业团队做后续加工,最终将这些创意转化成一部电影。让孩子们的天华不再被忽视。

“童行星球”计划还有一部分由纪录片团队执行,他们在跟进学生合唱团,进行纪录片拍摄。

## 给他们平等的机会

在跟这些孩子面对面交流



时,郝景芳发现,他们非常有想象力、思考能力、有很多爱好。他们的表达不一定有花哨的词汇,却思维清晰,非常有个性。她希望“奇幻影视故事创作”课程让孩子们将自己的创意表达出来。这样的机会在城市教育环境中有很多,但在贫寒的家

庭里却很少。

“虽然教育资源有差别,但孩子内心的丰富程度没有差别,有些孩子经历的更多坎坷还可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。”郝景芳说。

蒲公英中学是目前北京唯一一所打工子弟中学。学校副理

事长郭明,也是郝景芳在清华大学的学长。“我们打工子弟中学的孩子,比一般同龄人经历丰富一些。他们随父母东飘西荡,每个人背景都不一样。”郭明说,“他们的经历更有意思。”

郭明讲到学校曾经有过斗殴事件。事件发生后,学校组织同学们坐在一起开会讨论:什么是好的,什么是不好的。一位同学在黑板上写“被别人看不起”是负能量,另一个孩子则写道:“看不起别人”也是问题。这样的交流让叛逆的孩子们有了克制。

17日来夏令营做志愿者的一位中学生姑娘,给妈妈发了这样一段微信:今天看到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苦,生活条件很差,但就是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很累地在北京生存,留在一个城市真的挺难的,但更令人伤心的是,这些孩子不比那些有钱的孩子差。他们更加努力甚至更有才华。

## 对话郝景芳

《公益时报》:你创办的童行书院是怎样一个运作模式?

郝景芳:童行书院是公司注册,要做成一个社会企业,有一部分盈利项目,在贫困地区度假村开设亲子游,向城市家庭销售课程,用以支持团队运转和公益项目。公益方面,在城市中关注流动儿童,在贫困地区就做留守儿童的教育。同样的课程,在公益这部分是不收费的。

目前在崇礼万龙滑雪场的站点已经开始运行,贵州的两个站点正在建设,吉林也在洽谈。

除了一些通用的标准化课程,在不同地方课程设置会有所分别,比如贵州会结合当地民俗、艺术进行设计。另外也要考虑老师们的专业。比如在崇礼的两位老师,一个是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,参与过国产大飞机的研发,他开的课程就是飞行器相关的,带孩子们做航模,从中教授一

些物理知识。跟他同去的妻子是清华大学艺术史博士,自然就教授艺术类课程。老师在站点最短服务一年,保持相对稳定。

我们的课程能够通过城市中比较挑剔的父母的检验,让他们满意,说明水准是非常高的。这也保证了我们公益课程的质量。否则,如果只是集结一些人去山区上课,跟大学生志愿者支教也没什么区别。

《公益时报》:除了教育方面,怎么考虑贫困地区的儿童更基础的生活需求?

郝景芳:我们在贵州地区做过家访,了解了情况。设想是,为他们联系一些爱心人士,进行面对面交流、一对一帮助。这样的捐赠更有温度。

书院在中间不涉及募款,我们不是公益机构,没有募款资格,也不打算做成基金会。主要

精力还是投入到教育上,让孩子能够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,这样的帮助更大一点。有时候直接给钱,也并不能转化为对将来有用的能力。

在贵州的学校里,有些孩子确实学习差得不行,3年级以后就跟不上了,这样的孩子在现在的社会里很难找到谋生之道。而大部分家长的教育非常有限,虽然口头上说:“让读书,能读到哪儿就读到哪儿。”但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读书,没有能力与孩子进行精神上的交流,也不会给孩子买书,知识和资源上并不具备条件。

首先要帮助他们在个人能力上,突破父辈的能力天花板,然后在社会资源、渠道等方面,外界可以提供帮会组。如果能力不够,就很难有抓住机会、改变命运。所以要让孩子们知道,学知识、学本领才是改变命运

的途径,让他们领略到这点就不错了。

《公益时报》:我们面对城市和山村孩子有什么不同?

郝景芳:我们是以教育团队的身份过去。对他们的教育态度与在城市里教学没有差别。我们在培训老师时讲:企业文化只有一个词,就是尊重。尊重孩子的个性,尊重他们内心的意愿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你讲过自己支教中帮助了一个小女孩,但更多的同学就失去联系了。

郝景芳:那时候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。他们后来没有再跟我联系,我也没有主动去追踪他们的去向,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大三的学生,确实是无能为力。包括现在蒲公英中学这些孩子,对他们的去向也有些无能为力,只能是在教育内容中多传递一些东西,

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有好的发展。

《公益时报》:支教的经历影响到了您的工作选择吗?

郝景芳:对。我当时工作首选是研究机构,简历投到各种研究所、企业研究员之类的,但在得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 offer 后,就没再找其他的。在这里可以一边做研究、一边做公益。现在我也是两边兼顾。

做童行书院,基金会也很支持。今天上午方晋副秘书长就来支持我们活动,还把他女儿送来做志愿者。

《公益时报》:相对很多作家而言,你的态度一直非常温和。

郝景芳:清华给我的改变就是“行胜于言”,若只能批评不能做事的话,也没什么用处。所以如果我觉得什么东西不好,就去做点事情改变它。

